

何建章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何建章選集

何建章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2 16开 2.75 字数：521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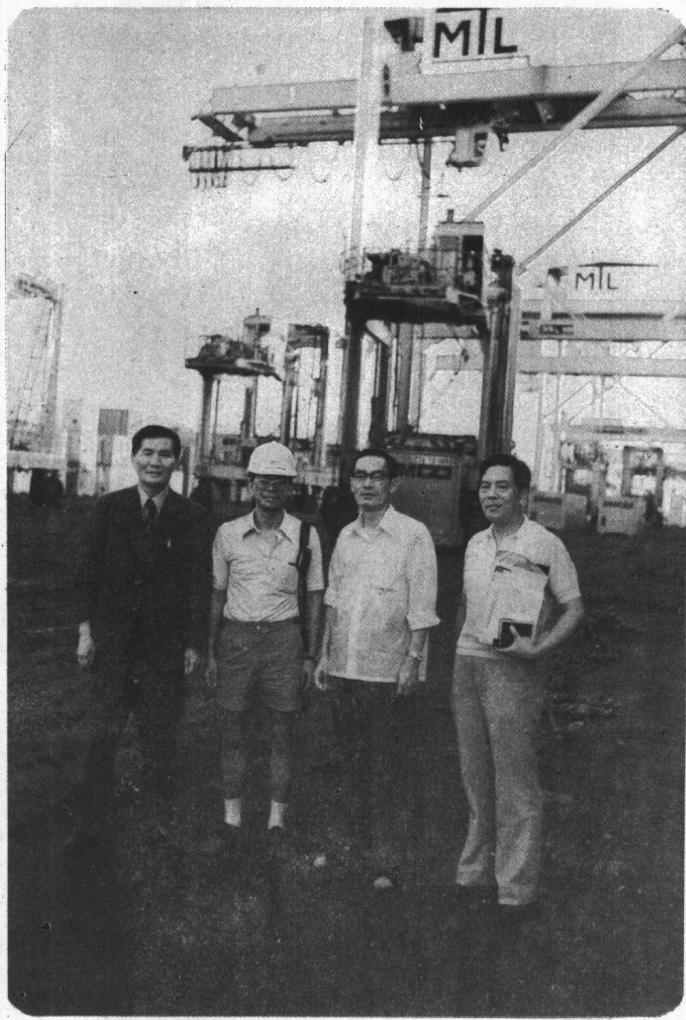
印数：1—3,300册

*

书号：4088·149 定价：(精装)6.90元
(平装)5.25元



作者近影



1980年参观香港采装箱码头

右起第二人为作者

高外同培院前身)，并到上海居住。据说是
被毛泽东派中国的外交工作人派的。最初，外
事工作是同防改修工作一同线的。甚
少少少有一段时间，没有往来的消息，就这
样被毛派走了。1949年7月随同胡宗南的
飞机同返一起到了北京，先在华北人民革命大
学学习了这一年。在这里，主要学习社会改造
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取不尽挖，改造资产
阶级世界观。对钱来说，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
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
从“革大”毕业后来到外国语学校，组织上分配
钱到俄语系的俄文。可是，只读了一个学期
由于工作需要，把钱调出来担任政治助理员
，专门从事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年后，又
由于工作需要，调钱到马列主义教研室，这是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授，而又担任政治经济
学课程的助教。当时是这样：先由苏联

(进阶教学)

$$20 \times 20 = 400$$

代自传

我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本来，我在大学攻读的是政治系。1945年暑期，我抱着改变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政治的天真愿望，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考入了复旦大学政治系。一年后，随学校迁到上海，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也随着毕业了。在大学时期，虽然也听过一些经济学的课，甚至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但毕竟主要是学习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和外交等方面的课程。而且这几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迁校，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火红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我也参加到这一历史激流中去了。所以，说实在的，在大学的几年里我没有真正学习到多少东西，更不要说得到多少经济学知识了。我在国民党的“国立大学”攻读政治系四年的主要收获是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政治才能进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上海解放后，我党外事部门在北京举办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并到上海招生。据说学校是培养新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的。我想，外事工作是国际政治工

作，同我的专业多少有一点联系，又向往未来的首都，就这样报考并被录取了。1949年7月我同被录取的其他同学一起到了北京，先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近一年。在这里，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联系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从“革大”毕业后回到外国语学校，组织上分配我到俄文部学习俄文。可是，只学了一个学期，由于工作需要，把我调出来担任政治助理员，专门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年后，又由于工作需要，调我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先是从事联共党史课程的助教，后又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当时是这样进行教学的：先由苏联专家向我们这些助教讲授，然后由我们向学生们传授，“现抄现卖”，勉为其难。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马列主义研究班，专门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师资。我由学校保送进入政治经济学分班学习了两年。研究班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苏联专家任教的。他们强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原著，特别强调要精读《资本论》，考试时在这方面的要求也很严格。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主要是这个时期掌握的。在这方面，我至今仍感谢我在苏联的老师们。

1954年7月，从研究班毕业后，我仍回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获讲师职称，并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组主任。1957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开招考“副博士研究生”，我报考并幸运地被录取了。可惜不久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向科学进军”也就偃旗息鼓，我的“博士梦”也随着幻灭了。从此成了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工作人员。

回顾近三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我曾有幸在我国三位老一辈

的著名经济学家领导下工作过，耳濡目染，得益匪浅。

大约在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左右，我被派到设在党中央宣传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工作。编写组主要由当时的科学处负责人于光远同志主持工作。为了做好写书准备，编写组每两周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做经济实际工作的负责人，讨论有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际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参与座谈会的组织工作和记录整理工作。座谈会的一大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解放，生动活泼。对于我这个长期脱离实际靠本本（讲稿）生活的“教书匠”来说，确有大开眼界之感。可是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左”的思想冲击越来越严重。这个“双周座谈会”就越来越不景气，以至在“四清运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裴多斐俱乐部”而被清算。不过，它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的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增进了我对实际经济生活的了解。

1959年下半年，我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是负责学术科的工作，后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组副组长职务。在此期间直至1964年10月，经济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四清”运动开始前，我主要在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同志的领导下，协助他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并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孙冶方同志尖锐地提出，要破除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的指导思想，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体系方法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严厉批判了实际经济工作中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讲求经济效果等等弊病。在他的影响下，我在这个时期写过一些文章：《略论〈资本论〉的体系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意义》，《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企业经济核

算》；《谈谈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与张卓元同志合作）等等。另外，还翻译了苏联奥斯特罗维强诺夫著《共产主义建设和商品货币关系》一书。我在上述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在“四清”运动过程中被当作“鼓吹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的“修正主义理论”，受到内部和公开的批判。在这种沉重压力下，孙冶方同志挺身而出，公开宣称，这些观点都是他的，而且认为我还没有表达清楚，不彻底。他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勇敢的回击了内外的围攻。直至被撤销所长职务和被捕入狱，他都丝毫不动摇。他这种不怕冒风险，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为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斗争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中，我再次被作为“孙冶方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1970年，随同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广大群众一起下放河南农村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又随同大家一起回到北京集中搞“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我早就靠边站，同运动中的派性斗争牵扯不大，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闲来无事，翻译了越南宣教司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我青少年时代在越南生活了十多年，粗通越文，趁机复习一番。顺便指出，“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取消了稿酬，我埋头苦译，真有一点“不计报酬”精神哩！

1973年，国务院酝酿进行工资改革，在国家计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工资改革理论小组”，从有关单位借调了一些人，我是其中之一。不过，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解决，理论界线不清。记得当时还有人坚持要搞供给制，反对搞工资制；赞成搞工资制的，也有人坚持贯彻“大体平均”的原则；认为

按劳分配也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即使暂时不能取消，也要加以限制；计件工资奖金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完全要不得，等等。1975年虽然也提出了一个很不彻底的工资改革方案初稿，但未出台就被“四人帮”斥之为“搞物质刺激”而告吹了。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什么著作，但从思想上检查，也不是没有问题。我虽然不赞成搞供给制，但是没有摆脱“左”的一套思想束缚，也是主张对按劳分配加以“限制”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我才逐步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努力跟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976年，国家计委成立经济研究所（后来又改称计划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于光远同志，第二任所长是薛暮桥同志。我参与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79年，我正式调到计委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晋升为研究员。这个时期主要研究计划体制改革问题。1978年底至1979年初，我参与讨论和修改薛暮桥同志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对于我熟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有很大帮助，特别是薛暮桥同志思想解放，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设想，给予我很大的启发。1979年，我在《经济研究》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此文于1985年被《经济研究》评为一等奖，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优秀论文奖。随后，我和王积业同志一起，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共同主编了《中国计划管理问题》一书。这本书是组织国家计委有关业务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我们力求反映我国计划管理的演变过程，从理论上探索计

划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

1984年8月下旬，我奉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并于今年4月初被任命为该所所长。社会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学科在我国中断多年，直到1979年才开始恢复，面临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任务是艰巨的。在这方面，我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了。当然，经济是基础，社会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经济研究终究要为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经济学和社会学是不可分的。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也是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已有的一点经济学知识对于研究社会学也许有一点帮助。列宁在论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伟大历史意义时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分析，“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①。我想，只要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资本论》为范例，“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②并吸收国内外现代社会学的优秀成果，就有可能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这一科学事业中作出一定的贡献。我愿意同我国的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朋友们和同志们为此而共同努力。

最后应该指出，收在这个集子的文章都是1984年以前写的。为了避免重复，有些文章的标题作了修改，内容有所删节，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加工，但基本观点没有变化。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鼓舞下，深入进行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也已经展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新鲜经验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和寻求解决的正确途径。反映在这个集子里的我的一些观点，过去不一定都是对的，今天更显得落后于实际了。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何建章

1985、6、7、

目 录

(一)

略论《资本论》的体系及其对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意义 (1)

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体系 (25)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45)

关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平衡直接和间接社会

劳动 (65)

我国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后的

商品命运问题 (76)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商品性 (88)

评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

模式 (95)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 (107)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39)

(二)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沿革 (161)

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形式 (177)

- 当前多种经济形式发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190)
积极扶持、适当发展城镇个体经济 (205)
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几个理论问题 (213)

(三)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然性 (232)
尊重客观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 (241)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宪 (257)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265)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
体制改革的方向 (280)
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价值规律
的作用 (301)
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 (320)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345)
再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355)
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体制 (369)
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 (374)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 (379)

(四)

- 为人民谋福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401)
略论基数和速度的关系 (411)
二十年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 (424)
实现二十年战略目标的第一个蓝图 (431)

-
- 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 (444)
继续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470)
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488)
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495)

(五)

- 提高经济效果 (502)
从提高经济效果方面狠下功夫 (507)
当前我国经济效果低的主要原因何在? (514)
怎样提高宏观经济效果? (528)
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企业经济核算 (541)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 (547)
谈谈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理论问题 (566)
评价企业经营好坏的标准 (570)

(六)

- 计划 市场 价格 (576)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与价格体制的改革 (585)
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 (602)
谈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基础的几个问题 (620)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问题 (629)
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生产价格作为工业品
 订价的基础 (654)
关于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价格政策的几个
 问题 (677)

- 评孙冶方的价值论 (686)
价值规律和价格政策 (693)
怎样搞活流通? (700)